



中国 教育 科研 参考

2020年第24期

总第(490)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20年12月30日

目 录

“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	黄启兵 田晓明 (02)
新文科——一场文科教育的革命.....	王铭玉 (09)
“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 ——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	赵奎英 (13)
新文科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向.....	段 禹 崔延强 (18)
社会需求与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	宁 琦 (25)
新文科与思维方式、学术创新.....	刘曙光 (29)

编者的话:新文科建设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一种积极探索。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计划2.0的意见》,“新文科”概念初现端倪。其后,教育部相继在《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系列文件中反复提及与新文科相关的理念和措施。为了更好把握“新文科”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我国新文科建设。本刊以“新文科建设”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王者鹤

责任编辑:段爱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二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289239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www.cah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动态栏目)

“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

黄启兵 田晓明

2018年8月，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半个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标志着国家“四新”建设工程正式开启。由此，“新文科”从概念提出走向正式实施。2019年6月20日，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指出：作为一项战略部署，国家试图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四新”建设总目标，并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让新文科这个翅膀硬起来，中国高等教育飞得才能平衡、飞得高”。“新文科”这一国家战略的启动，将对未来中国大学文科、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新文科”也极其自然地成为学界尤其是教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新文科”源于何处？“新”在哪里？“新文科”建设路径有哪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文科”溯源

何谓“新文科”？这一概念未见官方正式界定。我国学界对于“新文科”的界定，多从与传统文科的对比来进行。如冯果认为：“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其目的在于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是对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也有学者注意到“新文科”的中国特色问题，如马骥认为：“新文科是基于全球新技术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注重通过文科内部融通、文理交叉融合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知识体系，并引领学科发展。”总之，学界对“新文科”的界定可谓是见仁见智。界定“新文

科”，首先得弄清它从哪里来。

（一）“新文科”概念追溯

在我国，“文科”称谓早已有之，一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称。时下兴起的“新文科”却是个新词。

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提出源于欧美国家传统文科的式微。吴岩指出：“常有一种说法认为，‘新文科’的产生是由于欧美国家近年来文科式微，学生不再报名、选课，文科教师因此产生危机感，为了减缓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他们开始了创建新文科的努力。”但文科的式微，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现象。乔·古尔迪（Jo Guldi）就曾指出，“最近的半个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危机在每个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J.康利认为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科学拥有的自信心，到了八十年代已变为绝望”。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甚至宣称“死掉的文科”。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提出与传统文科的不足似乎没有直接联系”。

其实，“新文科”一词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曾出现过，尤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种报纸杂志屡屡出现“新文科”字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文科”是相对于当时所说的“旧文科”（尤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文科教育）而言。当时的“旧文科”被指责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新文科”就是要改变这“三脱离”，做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具体做法有：改变旧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精减课程内容，实施开门办学等。在史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文科事业发展遭遇到巨大冲击，有些学科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如心理学被称为“伪科学”而被勒令取缔。“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新文科”早已受到批判。显然，当下所说的“新文科”概念并非源于此。

学界一般认为：“新文科”概念源于美国。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认为：“2017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概念，他们所阐释的新文科主要是专业重组，不同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然而，打破专业界限进行跨学科学习绝非美国西拉姆学院的首创。早在1926年，“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便在美国出现。随着学术研究的综合化不断加强，“跨学科”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在法国召开了首届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76年，第一份国际跨学科学术杂志《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问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重视跨学科问题。1985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未来与发展》杂志于1985年第1期刊发了《跨学科学》论文。而且，美国教育界对西拉姆学院的改革也并不乐观。就我国“新文科”来说，也非仅仅局限于专业重组、学科交叉，还有许多新的特征，如强调中国特色，强调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等。

以上分析表明：“新文科”的提出与传统文科的式微并无直接联系，与“文化大革命”中所提的“新文科”毫不相干，与美国西拉姆学院所提的“新文科”也有迥异之处。那么，当前我们所言的“新文科”究竟源于何时，出自何处呢？

（二）“新文科”概念的实源

当前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源于2018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中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至少与三个方面有关：新技术的推动、新需求的产生以及新国情的要求。

1. 新技术改变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方式。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进入各个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深受其影响。在此背景下，“新文科”特别强调新技术。就学术研究而言，例如传统历史研究强调考证，强调做卡片，强调资料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互联网、大数据改变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式。有学者分析，目前大部分历史学研究资料几乎都已被数据化，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二十五史多媒体全文检索阅读系统、国学宝典等，研究资料的数据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手段和条件，考据学家恐怕

要失业了。就人才培养而言，原有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承，现在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强调创新；原有的授课方式是粉笔加黑板，现在的人才培养方式则更加多元；原有人才培养不存在的问题现在随着新技术的推动而不断涌现，如网瘾、上课玩手机……这些新技术使得文科不得不上新时代的烙印，迫使文科迎接新技术的挑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是纸质文献，现在是数字文献；过去运用拼音、四角号码、笔画等检索手段查资料，现在可以用强大的搜索引擎进行地毯式检索；过去用手工画，现在可以利用数据产生各种可视化效果；在教学手段上，也有了智慧黑板、远程教学和慕课等新形式。”

官方表述与学界声音也都强调新技术发展对文科发展带来的影响。例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世界的新变革，使得新文科的改革势在必行”，新文科“不仅要传承传统的、经典的文化，还要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变化。”邓绍根教授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价值理念。文科教育面临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需求，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

2. 新需求要求文科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追求创新与卓越。随着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社会对传统文科所培养人才的需求大量减少；二是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供给不足。很多传统的劳动让位于人工智能，传统人才已不符合社会需要。这不仅对理工科造成很大的冲击，对文科也是如此。例如广告业，纸质媒体时代所需的人才与现在自媒体时代所需的人才有很大差别。有学者称：“互联网诞生之前，广告业的竞争仅仅依靠追求精妙创意、大制作、大媒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广告的传统模式渐渐开始崩塌，广告不仅在呈现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其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信息流动从单向转向双向，追求互动成为互联网时代广告的精髓之一。”“广告企业在招聘时，对网络技术人才的需求最大”。当前社会减少了对劳动密集型人才的需求，更多地需要知识密集型、知识复合型、知识创新型人才。

吴岩指出，我国“新文科”建设的理由之一

就是“从中国发展来看，新时代呼唤新文科”。

“高校要成为新时代中国先进文化创造弘扬传播的策源地，要加快文科发展的步伐，只有在‘卓越’和‘拔尖’中做得更好，才能让文科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方法论和指导思想的作用。”林文勋认为：“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追踪学科前沿，不断加强咨政建言、服务社会的能力，提升为人文社会科学社会服务的贡献度与美誉度。”

3.新国情促使文科应具中国特色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当下我国所面临的新国情可以概括为：在国内，创建中国特色，树立文化自信，文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上，随着中国大国崛起，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要发出中国声音。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吴岩指出：“‘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走向成熟的伟大时代；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的中国方案的时代。”“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文科教育“关系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中国视野、中国格局、中国坐标，而是置于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不仅要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的制定”。

二、“新文科”的特性

（一）当前学界的的声音

“新文科”“新”在哪里？学界的观点不一，可谓见仁见智，或强调某一方面之“新”，或全面分析其“新”。

一是强调某一方面之“新”。如陈跃红强调“新文科”之“新”在于创新：“眼下提倡的新文科，不是新旧之新，而是创新之新，是立足于新科技时代，为了未来创新型人才培养，对文科提出的提升要求。换言之，是要打造‘2.0版新文科’。”魏琛分析“新文科”建设之“新”：“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与技术人文性，以求同存异、互鉴共进、协同发展为核心基准。”

二是全面分析其“新”。如刘艳红认为，“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学科协同之新、信息技术融入之新、人才培养模式之新等方面”。樊丽明认为“新文科”有四点“新”：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周毅、李卓卓提出新文科的特征有四个：新交叉、新功能、新范式、新路径。夏文斌强调四“新”：一是服务国家战略上有新要求；二是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三是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四是人文精神的现代传承。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各自阐释了“新文科”“新”在哪里，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新文科”之“新”。但有几个问题尚需探讨：一是有学者将传统文科同样、始终强调的内容也阐释为“新文科”之“新”，如传统文科也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这就难免有牵强之感；二是有学者将“新文科”本身具有的内容之“新”与如何建设“新文科”的举措之“新”混为一体，这将“新文科”的建设路径、方法选择异化为特点本身；三是有学者特别强调“新文科”之“新”在于“创新”，忽略了传统文科的合理部分，忽略了“新文科”应包括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其实，“文科”（文化）建设应当审慎使用“创新”一词。时常有人将“创新”误读、误解、误作为翻新（一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变换），而将“复兴”误读、误解为复古甚至复辟。其实，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糟粕成分的坚决剔

除，也有对优秀传统文化执着坚守和继承；不仅是对问题现实的无情批判，也有对现实成果的总结和提炼；不仅是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充分前瞻和恰当估计，也有对潜在风险可能的理性、冷静的预判和提醒。

那么，当前中国“新文科”之“新”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二）我国“新文科”之“新”

任何概念的提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也不例外。从“新文科”概念溯源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新背景至少体现为新技术的发展、新需求的产生、新国情的要求。在此新背景之下，文科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文科内各学科的交叉变得越来越明显，文理之间的交融也越来越需要。二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知识在应用下生产，知识为未来生产。三是文科发展需适合国情发展需要，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上发声。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说，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了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技术等大量新兴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与科技强国战略相匹配，与理学、工学新兴领域进行交叉融合，成为新文科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需求促使学科交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需求也不断变化，促进了交叉学科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对人才提出新需求。例如，李秀娟等人从人才需求的角度提出交叉仿生学科及其专业设立的必要。另一方面，社会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越来越需要多学科。例如南海争端问题，有人以1998—2016年在CSSCI和Web of Science上南海争端相关文章的期刊与图书类引文为样本，发现文献涉及的学科众多。例如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新闻学、经济学、历史学、环境科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公共管理学、教育学、民族学、水产养殖、艺术学、统计学等。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有学者统计，从诺贝尔奖设立到50年代，获奖项目中交叉学科数所占比率分别为36.23%、35.14%，进入50年代以来，在20世纪第三个25年中，诺贝尔奖中交叉学科比率由35.14%飙升至42.71%，增加了7.57%。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说，知识不再是“闲逸的好奇”，而是在应用下生产；知识不再是只解释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之为“模式1”，而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2”。相对于“模式1”来说，“模式2”具有一些新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知识在应用的背景下生产。在知识生产模式2的基础上，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等人进一步提出并阐释了知识生产模式3。知识生产模式3是为了知识创造、扩散与使用，由“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组成的模式。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模式、多节点和多边的体系，包括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创新网络以及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组成的知识集群。知识生产模式3特别强调创新，强调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强调知识集群，体现学科交叉的必要与学科边界的模糊。

从符合国情的角度说，当前我国文科发展需要满足两方面要求：一是中国的文科发展应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在文科发展过程中要体现中国特色，发展中国学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的特点应把握三个方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中国的文科发展不再局限于中国，而要放眼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要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担当大任。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可见，中国“新文科”固然具有世界学术体系所言“新文科”之普遍性特征，如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给文科带来冲击，导致文科逐渐式微，迫使文科进行改革和创新，促使美国西拉姆

学院提出的“新文科”进行专业重组与学科交叉。但中国“新文科”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深具中国特色：一方面，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是“自上而下型”的国家主张，“新文科”建设也是“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工程；另一方面，中国“新文科”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换言之，中国“新文科”之新，除了国家意志这一典型特色外，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体制所决定的，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此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国表现等一系列富有成效、让世界认可的国家主张或行动，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这是中国“新文科”区别于其他国家文科建设的最主要特征。

三、“新文科”的建设路径

任何改革都不应是对既有传统的简单否定或全盘抛弃，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此所谓“扬弃”。作为一种国家主张和一项国家工程，中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和“新文科”建设工程的推进，也不例外。建设中国“新文科”，不仅需要符合时代发展背景，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还要遵循学科发展内在逻辑和固有特点。因此，建设中国“新文科”，必须充分考虑并尊重时代背景、国家需求、大学和文科发展历史及其规律。

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从传统的“大学三功能说”演变历史来看，无论是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代表的、之于“博雅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还是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之于“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科学研究功能，还是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之于“大学服务和引领社会”的社会服务功能，这些功能的诞生、发展都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遵循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思考和选择中国“新文科”建设的战略路径，便成情理中事。此外，随着中国“新文科”建设工程的实施和推进，传统的大学文科管理范式也必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创新大学文科管理，也自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要

求。承应这样的挑战，大学文科建设必然会出台相应的新举措。总体而言，这些新举措应聚焦于四个方面：实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适应学术研究的新范式，确立顺应社会需求的新标准和探索文科管理的新方法。

（一）实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从培养目标来看，“新文科”应当注意人才培养中的创新、适应与卓越。就创新而言，传统的以继承为主的文科教育需要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文科教育。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从“守城”到“攻城”：传统的文科教育目标是培养“守城”人，而新的文科培养目标应是培养“攻城”人。“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工作者，想要在转基因、环境变迁、人工智能、生物本体的改造等领域进行新的批判，甚至对人类还没有探索到的领域进行人文关怀，就必须让自己的知识管理从‘守城式’变成‘攻城式’。”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新文科”所主张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创新，并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全盘否定，而是继承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提升与超越。就适应而言，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国家发展需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指出：“积极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紧扣国家发展需求，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着力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专业，改造提升传统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就卓越而言，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需注重卓越人才的培养，当前“双一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均涉及一流人才的培养。

从课程设置来看，传统文科课程设置难以适应当下的时代发展特点。众多学科专业课程结构不合理，有学者对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三所高校所开课程中，涉及新媒体、数学技术、营销传播类的课程并不多”，而广告企业的人才需求“主要集中在网络技术类、媒介类、客户服务类、策划类和设计类职位。其中网络技术人才需求最大”。课程设置的及时更新、学科专业的交叉已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教学方式来看，随着新技术的推进，新文科教学手段多样化，大量新技术渗透到文科教学中。例如法学教育，“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

+’等技术发展，法学教育在实验教学上面临着显著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其需求，使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和实现法学虚拟实验教学平台，能直击法律文书、案例研讨、模拟法庭与法律诊所等高校法学实践课程的痛点，使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实验平台与传统法学实验课程互相辅助”。再如文科实验室，文科教学从只关注资料室、图书馆到而今也需要建设实验室。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2018年9月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表示：“增设20个国家级新闻传播融媒体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50个新闻传播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加快培养会使善用‘十八般兵器’的全媒体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二）适应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就学术研究技术化而言，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进，文科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在当今文科的学术研究中，新技术越来越渗透于其中。不会运用新技术从事文科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难。从学术资料的角度来说，当前许多学术资料都已经实现数据化，资料的数据化使得研究资料的获得越来越便捷，不会运用互联网、数据库来获得资料必然导致研究的落后。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文科出现越来越多的与新技术关联的研究方法。例如，就历史研究而言，随着统计软件的层出不穷，传统计量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就比较研究而言，随着互联网、数据库的普及，以前信息迟滞而现在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文科研究者不得不认同、适应和接受学术研究的技术化。马费成认为，“电子踪迹、社交媒体、数字文本以及空间位置信息等大规模数据已经广泛渗透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并通过具体例子表示在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方法和分析手段，可以实时洞察热点事件，更好地解读人类行为规律，用科学来破解文学争议，有利于宏观分析历史变化等。

就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而言，传统的文科研究多是单打独斗、单兵作战式的研究，研究者也常自诩为“闲云野鹤”。传统的文科研究范式可以形象地描述为“跑单帮”的“挑货郎”，显然，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如何将传统“跑单帮”的“挑货郎”工作样态打造成“跑马

帮”的“团队”样式，“跨学科”建设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便成为高校文科科研管理必然的路径选择。从现代知识生产来看，“交叉学科已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学科的外围事件，教与学、研究与学术以及服务工作，不再简单地是学科内部或学科外部的问题，学科交叉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我国文科发展尤其重视多学科交叉。例如，数字人文就是近年来新兴的文理交叉领域，“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的专家与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合作，使数字仓储、文本挖掘、数字图书馆、虚拟现实、信息可视化等信息技术在人文领域得到应用，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就学术研究的应用性而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适应社会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上发声。一是适应社会需要。文科学术研究不再是“书斋式”的自我兴趣沉湎，也不是“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而是要“走出校园”，密切联系社会，深入了解社会，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功能，服务于社会。二是体现中国特色。学术研究应扎根于神州大地，体现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尤其对于体现中国特色的“绝学”“冷门”学科，要加以保护。三是在世界舞台上发声。我国文科学术研究不仅要体现中国特色，更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学术研究应特别强调卓越。

（三）确立顺应社会需求的新标准

传统文科的学术研究往往是象牙塔式的研究，文科学者强调个体学术兴趣，不太关注，甚至看轻或无视国家、社会需求；即使有学者重视国家、社会需求，往往由于囿于私人书斋而苦于缺乏相应平台或通道。当前“新文科”建设特别强调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特别需要学校管理者建立平台，打通大学文科发展与国家、社会需要的联结通道。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各高校蜂拥而起，正是顺应社会需求、建立联结通道的表现。

相对于强调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的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十分强调和注重大学社会服务功能。这一理念（威斯康星理念）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却影响甚至主宰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就

社会服务功能而言，“智库”即便不是现代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有效彰显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路径选择，依托大学丰富的文科资源，可以将大学智库建设成为连接区域与世界创新体系的“桥头堡”，成为储备先进科研成果和先进管理理念的“蓄水池”，成为学界、业界和政界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比如，中国高校第一家以“智库”名称命名的高校智库“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连续6次举办“对话苏州发展”高阶论坛，助推苏州改革发展；“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将苏州科技大学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特色、优势学科与心理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有机融合，研究成果不仅得到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而且促进、支撑了苏州名城保护相关法规的出台。这两家大学智库分别获批为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且均已跻身“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简称CTTI）。这一系列成功实践，也再次有力验证了“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并服务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的出现，对大学文科建设最直接的挑战就是科研成果的评价。传统的大学文科科研评价主要关注科研项目、论文、著作、获奖等指标的数量和等级，这也几乎成为学术共同体衡量学者学术水平、治学能力的基本共识和通用标准。中国“新文科”建设强调，大学不仅需要一如既往地繁荣和发展学术事业，还要积极、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需求。对大学文科而言，不仅需要以传承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还要成为国家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显然，这一时代要求不仅对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学术评价理念提出了挑战，也给大学文科管理实践（尤其是文科科研评价制度）提出了刚性的变革要求。总而言之，“新文科”建设必须确立顺应国家需要和社会需求的新标准。

（四）探索文科管理的新方法

顺应“新文科”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高校文科管理（尤其是文科科研评价）应当遵循六项基本原则：遵循“差异性原则”，精准把握科学理性；遵循“历史性原则”，消解马太负效应；遵循“开放性原则”，

优化管理层级结构；遵循“多元性原则”，有效实施分类管理；遵循“人本化原则”，充分彰显人文关怀；遵循“特殊性原则”（或称“例外原则”），有效修正管理偏差。据此，可使整个评价系统运作富有弹性与契合度，最大限度地催生学术机体组织正反馈建设性进化，使研究者拥有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此外，在高校文科管理制度设计过程中，还应当关注三点：模糊学科界限，建设跨学科平台，扶持特色、优势学科。就模糊学科界限而言，传统的文科管理特别强调学科边界，例如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首先必须确定学科归属，甚至是按岗位、身份来确定研究人员所在学科。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应当模糊学科边界，至少可以让研究者自行确定自己所研究的学科领域，从而减少很多无谓的争执，促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促使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就建设跨学科平台而言，这是联结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促进各学科研究人员沟通的有效方式。顺应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多个高校相继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平台，如北京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上海交通大学跨学科叙事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等。此外，“新文科”建设不仅仅是体现新技术，面向创新，而且要符合新国情，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特色，阐述中国理论。通过扶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铸就中国的文化自信。通过扶持优势学科，追求文科的卓越。这样，文科才能“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黄启兵，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江苏苏州 2515123；田晓明，苏州科技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51009）

（原文刊载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新文科

——一场文科教育的革命

王铭玉

近些年来，伴随社会的快速发展，文科领域出现了很多变化，一些新文科的雏形逐渐显出，比如与国别区域研究相关，出现了美国学、日本学、俄罗斯学、英国学、非洲学、中亚学等；与伦理学相关，出现了人工智能伦理、医学伦理、自媒体伦理、网络伦理等；与智能学交叉，智能政治学、智能新闻学、智能教育学、智能社会学等应运而生。这些新文科研究方向的产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场教育的革命带来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新文科的产生是既有文科教育的不足引起的。一是理念问题，传统教育对文科教育并不重视，“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谓明证。受此影响，一些人文类课程在高校常被边缘化，课时设置不足。二是定位问题，包括教学定位、功能定位以及属性定位。比如我们如何看待大学语文和大学外语的问题，它们二者明明具有人文学科属性，但经常被人们打上“工具”烙印，处于尴尬模糊地界。三是设置问题，相当一段时期，高校“千校一面”情况突出，给文科带来的直接后果表现在：专业设置相似相仿、学科特色淡化缺乏、学术研究前瞻弱化、课程体系无视需求、问题意识少有观照等。

新文科的产生是内在和外在需求促成的。一是文科教育具有特殊的自身价值。文科讲究积淀，它不仅富有相关学科门类的专业知识，更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成果，规范并引导着人类对自身及社会的进一步认知和探索。教育是一个“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求真”之主旨与自然科学教育关系密切，而“求善”“求美”往往是文科教育追求的

目标。在立德树人过程中，高校文科教育意义重大，它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养成独立的思维品格，学会与社会外界的沟通，提升自身的生存交往能力。二是当前环境的特殊外在要求。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是“多而全”，即权势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社会全息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孤岛难存，不断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对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日益频繁，迫切需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文科的产生是与“四新”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的。2016年，我国提出要建设和发展新工科，其缘由是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联盟（IEA）《华盛顿协议》组织，这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自此，新工科建设在学术探讨和建设实践方面均呈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17年，教育部牵头，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召开现场会，接连推出“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等纲领性文件，助推新工科建设进入快速的节奏。国家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建设“新工科”，培养自然科学家，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还需要建设“新文科”，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主动回应社会变革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2018年5月24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2018年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提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的倡议，其主要精神可以归结为四个关键词，即“打造一流本科专业集群+

覆盖全部学科门类+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换言之，“四新”学科建设总的目标是在我国原有学科基础上，通过学科整合，开拓创新，凝练特色，建成具有反映中国特色理论水平、学术水平和话语水平的世界一流学科，进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新文科建设要加强对“新”所承载的内涵的理解。“新文科”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新生的概念，然而，把新文科建设提升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高度则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文科建设的一件头等大事。“新文科是相对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发展建设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新文科建设并不是搞一场“颠覆”性革命，不是要否定传统文科，而是在“守正创新”原则指导下的一场“接续”性革命。此处的“新”表明了今后文科建设的取向，是指在原有文科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文科的学科内涵以及文科人才培养目标，探索新的建设模式，以此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满足国家的建设需求，供给社会的实际需求。

新文科建设要把握学科的延展、增长和突破。新文科的增长方式共有三种：一是存量延展的结果，主要是对一些传统文科学科，更准确而言，是对已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本身的升级改造。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的内涵更加丰满，它尝试将传统新闻学与新媒体、艺术学结合起来，在“全媒体”上做文章，培养行业需要的新型传媒人才；经济学、管理学这些传统学科，积极回应能源、生态、气候等重大问题，以国家战略之需来完善学科自身建设。二是增量交叉的结果，主要是指受新科技、新产业、新问题的驱动，以交叉学科为主要标志的新兴学科的

生长。此类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科学科内部彼此交叉，比如，语言学与相邻文科学科交叉产生了政治语言学、语言哲学、经济语言学等；二是人文科学与医、农、工等学科出现多种交叉学科，比如工程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生态语言等。三是学科整合的结果，主要是指多学科的互相渗透、协同攻关。比如201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已经把“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的方向之一，对这门新兴的国别区域学，除了传统的分学科研究以外，比如从历史、政治、语言文学、教育等角度的研究，还可从国际关系、地域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角度开展综合性研究，尤其还应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新文科建设要面向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范式 and 新的社会需求。一是创新领域的新对象促生的新文科。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大量新兴技术的出现反映了时代的新潮和新的研究方向，引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文社会学科不可能“独善其身”，纷纷与理学、工学的新兴领域产生了交叉融合。例如，与无人驾驶技术配套的相关法律、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研究等。二是传统研究范式转变带来的新文科。范式变革本身就是革命，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全样本数据分析和处理对人文社会科学愈显重要，在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文科增长点。比如，编程、大数据采集和信息处理等技术已被社会科学学科所广泛采纳，机器学习或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也被社会问题研究所广泛运用，它们相继成为新的文科研究领域。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新变化涌现的新文科。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是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些共通性问题规范着社会的进程，也给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发展带来新的诉求。比如，人工智能的强势发展为其他学科带来了新的需求，产生了智能法学、智能政治学、智能社会学、智能伦理学、智能新闻

学、智能教育学等智能社会科学学科。

五个特征决定了新文科建设的走向。新文科的概念绝不是一个单纯停留在学科形态层面的问题，这一概念在提出之时，就带有系统化的概念认知特征。换言之，新文科在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特征的基础上，还应具有战略性、创新性、开放性、系统性、针对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表明了新文科建设的走向。战略性是新文科的价值所在。大学的职能之一是服务社会，具体新文科而言，对外要能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增强我国的话语表达能力，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话语权；对内则能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服务，积极回应人们思想观念、精神价值等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需求。创新性是新文科的属性特征。新文科的“新”本身就包含着“创新性”，能归入新文科行列的学科一定具有“新”的特征。要么是学科有突破，实现了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要么是学科有革新，反映了对传统学科进行的转型、改造和升级；要么是学科有创建，出现了孕育、延伸和拓展之后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放性是新文科的学科特点。“新文科建设要能够密切关注社会需求变化，动态指导并实施新文科建设的具体内容和建设方法手段。新文科建设不但要体现出学科内涵上的包容性，还要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灵活性。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借鉴其他国家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学习其他学科建设的经验理念，灵活把握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系统性是新文科的根基所在。新文科建设既是学科发展问题，也是教育战略实施问题；既是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人才培养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因此，新文科建设是一个涉及理论、研究、实践、方法等方面的系统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针对性是新文科的客观标准。新文科建设就是针对传统文科的发展问题提出新的设想和建设方案，但绝不是要把文科改造成为其他学科。

同时，新文科建设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更不能采用固定的标准来指导新文科建设。因此，高等院校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与特色，按照新文科建设的基本要求，结合自身学科基础开展新文科建设。

五字方针奠定了新文科建设的学理基础。新文科建设要具有可操作性，可以从“大”“新”“融”“通”“特”等几个方面开展新文科的具体建设及规划。“大”就是设立大文科。可以将一些相关相近的学科按照特定的设计和需求合理整合、交叉、跨越，开展学科定位重构。例如，对传统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进行整合形成国学等大文科；对社会科学所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整合形成中国社会学等大文科。“新”就是发展新兴学科。通过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设立新的学科定位，如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学，在工科等领域的计算机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通过伦理来指导人工智能发展，如机器人伦理，网络伦理，自媒体伦理等等。“融”就是融入新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以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使得文理学科之间泾渭分明。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将智能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大数据、云计算等研究方法融入新文科建设研究方法和教育手段当中，以此来推动文科类学科的发展。“通”就是开展跨学科的新文科建设。达到通晓不同领域知识体系的能力和操作技能。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理工科院校开办的文科专业，对于文科人才培养内涵具有深远的意义，出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意识的边缘交叉学科，如信息科学、环境科学、工业设计、工业管理等。“特”就是要发展我国独有的学科方向。以民族学为例，我国特有的民族语言文化建设直接关乎国家的语言文化安全，我国特有的文化典籍阐释直接关乎中华文明的内涵，它们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新文科建设要根据国家的

需要和文化特色来凝练重组学科结构，创新开拓新兴交叉点。

五条路径铺就了新文科建设的人才培养之道。一是大类招生、大类培养，走大文科的发展路径，把人文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建设成为大人文学科或大社会学科，如国学、中国学、中国年代学等学科，将相关学科融合到一起，进行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规划和培养实践。二是学科交叉、跨类培养，例如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交叉，或通过与理工科交叉的手段，获取理工科的成果构建新文科，例如外语教育学、智能伦理学、智能管理学等学科建设。三是主辅结合、混合培养，采用主修课程与辅修课程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兼具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理论及研究方法。四是学科重组、融合培养，例如构建大外语学科，依托外语学科构建国别区域学，如美国学、英国学、非洲学、中亚学等涵盖语言、文化、社会、宗教、民族等综合学科在内的大外语学科。五是中外结合、跨界培养，利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采取中外联合培养，通过中外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中外学科间的互补与交叉。

五项举措体现了新文科建设的质量保障。一是把握新文科教学质量标准。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专业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并陆续对一些综合性和师范类院校的相关专业开展三级认证工作，新文科建设要抓住时机，在新文科质量标准体系和监控体系上做文章，尽早出台既适应时代发展、又能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新文科质量保障体系。二是组建跨学科的复合课程群。传统意义上的课程，过度重视知识的学科归属和逻辑体系，忽视了知识体系的自身完整性及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时代的人才观要求塑造具有“广博+纵深”知识面的T型知识结构的创新型人才，为此我们需要超越学科中心，组建以知识主题为导向的复合课程群，努力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跨越学科界限的知

识视野和思维方式。三是探索开放式课程教学体系。目前，产教融合、科教结合、校企合作、中外交流的统合育人机制已经逐渐形成，一场以新科技新技术为导向、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以人才产出为导向、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课程体系重构改革显得格外紧迫。四是构建协同式学科平台。

“围墙”是中国高校的形式特征，它的基本功能就是“阻断”和“隔离”，而新文科建设正是要冲破这种人为的藩篱，在组织上由隔离走向协同，打造具有整体观的学科平台。高校可以按照研究方向，采用学科整合方法，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设立有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南京大学设有“学科特区”，这些举措都可看作是对新文科建设的尝试。五是创立管理新模式。管理模式的变革首先要从学习模式的改革做起，传统专业教育要求是“从一而终”的，是一种刚性的管理及培养模式，而“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是一种柔性模式，它构架的是更加灵活的菜单式、可定制的自主学习模式。

新文科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国家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给文科教育带来了一场革命，但新文科建设要符合教育规律，不能走运动式的发展轨迹，尤其要注意不同类型高校不能搞一刀切，应各有侧重、分类实施。同时，应从本体论上来考虑“新文科”概念本身，不能简单地把“新文科”理解为“新+文科”，也不能把“文科”简单地理解为“人文学科”，更不能把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与西方的新文科改革简单划等号。此文的目的正在于投石问路，就教于方家！

（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天津300270）

（原文刊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新文科” “超学科” 与 “共同体”

——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

赵奎英

自从“新文科”在我国语境中提出以来，国内各界关于新文科的讨论很多，这些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文科展开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比较有共识的一点是，新文科意味着学科之间一种深度的交叉融合。新文科的确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但它不止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还包含着一种“超学科”视野，意味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解决的新型研究与教育。但这一重要观念在现有讨论中尚未得到凸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对新文科这一概念的提出缺乏正本清源式梳理，以至人们在谈论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时存在一些错讹，无法看到它与“超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无法看到共同体思维对于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这里试从“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为起点，对相关问题作一探讨梳理。

一、“新文科”概念的提出

目前在对“新文科”的讨论中，很多人都谈到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来的。也有个别学者质疑这一说法，把“新文科”的活动往前追溯到强调“两种文化”融合的“沃勒斯坦小组”，但从该小组发表于1996年的《开放社会科学》报告来看，他们也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只是谈到了“新社会科学”（new social science）。实际上据希拉·托拜厄斯（Sheila Tobias）一篇《回顾1980—1990年的新文科倡议》的报告，这一概念应该在1980年就由美国“斯隆基金会”提出来了。报告中说：“任何为文科生定义和整合有关工程和技术的课程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到一个主要前身，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倡议（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其在1980—1990年之间斥资2000万美元，定义、启动并实施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课程和项目，将技术和定量素养纳入古典文科的研究领域。”另据1982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短

评《文科的新出路？》，美国学者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于1981年就已经出版“新文科”小册子了。因为这篇评论中谈道：“斯蒂芬·怀特先生去年出版的名为《新文科》的小册子引起的骚动至今仍未平息。”而怀特也正是“新文科倡议”的一位激进的参与者。新文科在美国的出现与人文学科遭遇的危机有关。自“新文科”提出以来，尤其是在新文科倡议的十年计划期间，美国教育界对于这一概念有不少讨论和实践。据《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报告，“新文科项目的第一批补助金是在1982年到1985年年底发放的，总共大约有1200万美元被拨给了这个项目”。

2017年10月，美国希拉姆学院开始进行重组，2018年，希拉姆学院院长洛里·瓦洛特（Lori Varlotta）发表《为新文科设计模型》的文章，对他们的做法和理念进行总结，力图使希拉姆学院“成为一个综合学习、高影响力经历和正念技术的典范”，使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实践得以广为人知。也许正因为此，国内不少学者在谈到新文科这一概念的来源时，都说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美国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实践离这一概念最初提出已将近40年了。在这几十年间，有关新文科的研究也在进行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和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都曾出版“新文科系列”的研究专著。如出版于1984年的《语言的生物学视野》，就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新文科系列”（New Liberal Arts Series）。据希拉·托拜厄斯的回顾，斯隆基金会计划在1980—1990年间，资助10部相关研究著作出版。

“新文科”的概念在我国是于2018年正式提出来的。2018年8月份，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文件里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9年2月26日，在教育部召开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

司长范海林介绍道，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又更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而“新文科建设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新文科在我国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自新文科在我国语境中提出以来，目前国内各界关于新文科的讨论很多。但新文科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比较有共识的一点是，新文科意味着一种学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尤其是文科与理科、人文与科技的融合。这一点确实也是新文科在西方最初提出时的主要内涵。最早出版《新文科》小册子的斯蒂芬·怀特认为，“如果忽视数学和计算机语言，文科教育就不再完整”。塞缪尔·戈德堡(Samuel Goldberg)在《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报告中也指出：“斯隆基金会的新文科项目旨在鼓励在大学课程中把定量推理和技术放在中心位置。它认识到，现代素质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熟悉他们所生活的技术世界，并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定量方法、数学和计算机模型以及技术思维模型的应用有经验和适应能力。”我国13部委在启动新文科时，也明确提到“新文科建设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由此可见，在新文科要使文科与新科技革命相融合这一点上，国内外各界已形成了共识。但“新文科”不仅意味着文科与新科学技术的融合，或者说文科与新技术的融合不是最终目的，学科交叉融合是为了“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为了更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超学科”的目标，这也使得“新文科”概念与“超学科”概念具有相通性。

二、新文科与“超学科”视野

从前面梳理可以看出，“新文科”这一概念在西方已有近40年的历史，新文科的最初内涵主要是使文科教育与新科学技术相结合，给学生提供一种综合的跨学科学习。但新文科从最初提出

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止于原来的“跨学科”含义，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视野。但“超学科”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并不比“新文科”概念晚，而是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由欧洲学者提出来了。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新文科”这一概念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受到“超学科”概念的某种影响，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罢了。“超学科”不是彻底地超越学科，不是让学科消失，而是代表着一种最高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超学科”不同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因为无论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还是“跨学科”，涉及的都还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事情，但“超学科”不仅指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还包括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还包括专业内学者与“专业外”的各行各业人士的跨界合作，因此它代表着一种更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跨学科”。

但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超学科，都不是为了学科本身，超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教育和研究中由于专业分工导致的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因为“超学科性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各行从业者共同工作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就像《超学科手册》序言中所说的：“在一个以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和日益增强的互联性为特征的世界里，越来越需要科学来帮助解决持续的、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一些目前众所周知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且还包括贫困、安全和治理等相关问题。”这样的复杂问题，显然是单一学科或仅仅是学科内的研究难以解决的。“因为没有一门单独的学科或单独的知识分支有希望为我们文明中令人生畏的问题提供突破性的解决办法，例如：贫困、自残的疾病、不平等的食物和水的分配、气候控制等等。”而现代以来的研究、高等教育以及一般的社会机构的持续分化，又加深了这一困境。而一般的“多学科”研究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多学科研究从学科范围的认知入手；但每一门学科都以自我控制的方式运作，各学科之间几乎没有交叉影响，也没有结果上的协同作用”。

“超学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

超学科的提出受到系统论的影响，但其目的是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因此，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于1972年提出“超学科”这个术语时，他设想的是一种以知识整合为导向的、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复杂性的系统理论方法。他说：超学科涉及教育/创新体系中所有学科和跨学科之间的协调，其基础是一种广义公理(从目的层次引入)和一种新兴的认识论模式。他根据超学科的理念，在对整个社会规划的创新中提出对大学结构的重组，使之成为一个面向“增强社会持续自我更新能力”的教育/创新系统。这个系统由四个层面组成：经验性(物理无生命世界、物理有生命世界、人类心理世界)、实用性(物理技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规范性(社会制度设计)和合目的性(意指价值)层面。在这个系统中，价值观至为关键，它涉及教育创新系统各级的活动，并使这些活动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在1979年出版于美国的《跨学科论文集》中，美国哲学家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也“将超学科定位于科学的哲学和教育维度”，并“将这一概念与一组科学家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科学家致力于系统地确定如何克服专业化的负面影响，使教育和研究更具有社会相关性。”

由此可以看出，“超学科”是一种系统观念影响下的，起于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的，反对将科学与社会、知识与实践分裂，反对专业化、学科化导致的知识的碎片化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知识生产方式和新型教育理念。超学科不是对学科性的彻底否定或抛弃，也不是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代表着一种最高层次的“跨学科”。它是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在超学科或相关术语的定义中，有四个核心关注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关注；第二，学科范式的超越与整合；第三，参与式研究；第四，寻求学科以外知识的统一。”像前面提到的生态环境问题，贫困、治理问题，以及目前所遭遇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显然都属于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学科范式的超越与整合，需要许多学科、许多机构和各行各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因此也都需要这样“超学科”

的创新研究和教育。

随着超学科概念的发展，超学科教育在西方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语境中。哲学、文学、历史、人类学、地理、宗教和区域研究等都被赋予某种超学科的特征。“超学科的标签也出现在其他教育领域，包括和平与安全研究，生态与环境研究，艺术和工程研究。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的超学科科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内涵。超学科科学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跨学科研究形式，它为定义和分析人类健康和福祉中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制度因素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框架(Rosenfield, 1992)”。 “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CIRET)正在发展一种由“科学复杂性世界观”决定的“新的思想的普遍性和教育的类型”。而雅克·德洛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上则提出了当代学习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存，学会做人。”由此可以看出，“超学科”教育在国际世界中的进展，也可以看出，超学科研究和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理论解决目前教育和研究中由于专业分工导致的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以让人类更好地共同生活、共同存在下去。

“超学科”在西方的提出虽然远早于“新文科”概念，并且它的提出也不是为了专门解决传统文科所面临的危机，但从新文科提出时的一些看法和美国希拉姆学院组建新文科时的一些做法，可以明显看出“新文科”与“超学科”的联系。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包含四个要素，其中两个要素是：综合专业(Integrated major)和相干核心课程(Coherent core)。希拉姆学院院长瓦洛特在《为新文科设计模型》中说：“明年之内，我们计划对希拉姆学院现有的核心课程进行全面检查，并牢记这些目标。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不同学科如何处理重要问题，新文科要求学生选择一套相互关联的核心课程，以应对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挑战。我们的话题很有趣，比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国际市场经济，以及食品、水和医疗保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与超学科的理念是根本相通的。无论是新文科还是超学科，都提出当今的教育要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而复杂问题，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才会遇到，而是全人类都

会遇到的。那种具有“超学科”视野的“新文科”研究和教育因此也是哪个国家都需要的。只不过有些复杂问题可能是特定国家遇到的问题，有些复杂问题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当要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复杂问题时，仅有“超学科”视野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引入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至“宇宙生命或生态共同体”建立的“共同体”思维。

三、超学科与“共同体”思维

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当今世界正“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提到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问题。“共同体”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共同体”问题实际上正联系着国内国际的复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回顾中国五年来的伟大成就时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又谈道：“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这里提到的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挑战，包括发展不平衡问题，脱贫攻坚问题，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新安全观问题，国际新秩序问题，全球治理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哪一个不是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这些复杂问题显然不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甚至不是仅靠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能够解决的。同时有一些重大复杂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如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全球安全等。这就不仅需要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内的“超学科”合作，而是需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学科之间、学

科内与学科外之间的相互合作。而这种合作就不仅需要超学科理念，而且需要跨文化、跨文明、跨制度、跨意识形态合作的“共同体”思维。就拿这次全球突发性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来说，这不是医学学科单独能够解决的、也不是能够仅靠医学学科与其他学科合作解决的。这是一个由政党、政府、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全体民众等共同参与、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艰巨行动。同时，对于这种全球性的重大流行病来说，也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而是需要跨越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偏见，各国的专家、政府、机构、民众联手来，通力合作，共同打胜这场战役。同时，这场疫情也让我们更切实地感受到需要认真思考人类与动物、与自然以及所有存在者和谐共生的关系，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宇宙生态共同体”。

因为在当今时代，如果人类不关心那个“包含人类但又不限于人类世界 (More — Than — Human world)”[□] 璩臻的更广大的宇宙生命或生态共同体的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很难建立的。冯友兰先生曾经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天地境界”，也是指人“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就社会组织来说，他是一个公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民’，或称‘宇宙公民’。”作为“宇宙公民”，人类就不仅要为人类谋利益、谋福祉，人类还要考虑“为宇宙的好处”做事情。璩臻 冯友兰所说的这种“宇宙公民”，特别像今天所说的“生态公民”。这个“大全”的宇宙整体，也可以说是一个“宇宙生态共同体”。“天地境界”，不是不讲道德，而是遵循一种更博大的施及天地万物或称“宇宙公民”的生态伦理道德，为一个更广大的“宇宙生态共同体”的建立而做各种事。但无论什么样的共同体建立，都既需要“超学科”视野，又需要“共同体”思维，来解决更广大范围的“共同利益”问题。

一般地说，当需要“a) 把握问题的复杂性，b) 考虑到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认识，c) 将抽象的和具体的案例知识联系起来，d) 构成促

进被认为是共同利益的知识和实践”时，就特别适合运用超学科的理念和范式。战胜全球性重大流行性疾病，显然需要“把握问题的复杂性”，需要“考虑到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认识”，这显然也是在促进构成“共同利益的知识和实践”。因此需要引入“超学科”的视野。而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分裂和对抗来看，仅有“超学科”视野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共同体”的思维。超学科致力于打破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来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共同体思维则力图打破种族（甚至物种）、文化、制度、国家、地区等之间的隔阂，把全世界、全人类甚至所有存在者联合起来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但“共同体”和“超学科”的根本目标又具有一致之处，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促成更广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和福祉。共同体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抹平差异、消除身份的同质化世界，而是要建立“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的世界。而超学科也不是没有任何边界的同质化合作，而是旨在“打破知识的界限，修复文化的鸿沟和防止学科的分裂”，“目的是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边界的在任何水平上的统一的同质融合”。二者结合起来无疑对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复杂问题，对促进全人类甚至全体存在者的共同利益和福祉，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当今研究和教育的重要转变，不只是文科研究和教育如何适应和运用新技术，以便在一个技术世界里更好地生存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如何利用新科技，以一种“超学科”视野和“共同体”思维，在一个人与人、国与国、人类存在者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复杂世界里，共同面对和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以促进人类和所有存在者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存在、共同福祉的问题。这是当今的新文科研究和教育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报告，也正是在呼唤和促进这种面向复杂问题的教育理念的转变。报告中说：“当今世界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变化引发了紧张不安。人们寄希望于教育能够

培养个人和社会掌握适应变化并做出反应的能力。”又说：“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向往，迫使我们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消除普遍存在的矛盾，同时拓宽视野。技术发展增进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为彼此交流、合作与团结提供了渠道。但我们也发现，文化和宗教不宽容、基于身份的政治鼓动和冲突日益增多。”“教育必须找到应对这类挑战的办法，同时兼顾多种世界观和其他知识体系。还要考虑到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组织方式，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报告中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全球教育共同面对的处境，也是我们当今的新文科建设提出的总体背景。对于新文科的丰富内涵，我们会逐步展开探讨，但现在如果主要从这一处境出发来看新文科的内涵的话，我们认为新文科的研究与教育在强调文科与理科、人文与科技交叉融合的同时，还要以超学科视野和共同体思维，面向生活世界中复杂问题的解决，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宇宙生态共同体”的建立，以促进最广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和福祉为目的。

海德格尔后期主要用“天、地、神、人”来表达他的“存在者整体”概念，把“天地神人”四方世界的“自由游戏”称作“诗意地栖居”，在一个未来世界中，“存在者整体”也许还会进一步扩大，从“天地神人”扩大到“天地神人机”。因为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未来人类的研究和教育，无疑将面对一个更加复杂多元的生活世界或“存在者整体”，面对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我们的新文科研究和教育也需要更早地做好处理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重大问题的准备。而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重大复杂问题，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建构无疑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解决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问题是一切类型创新的终极基础和源始动力。

（赵奎英，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3）

（原文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新文科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向

段 禹 崔延强

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哲学社会科学（以下简称“文科”）是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的思想先导；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反映着一所大学的人文底蕴，更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深刻思想内涵。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于天津联合召开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上提出，要按照《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要求，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推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在我国新工科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的背景下，如何开展新文科建设，提升文科教育质量，使之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推动文科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这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亟待澄清的重要问题。目前学界对于新文科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新文科建设整体的宏观把握以及具体建设路径的分析，本文试就此进行讨论。

一、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

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新时代的复合型人才，不仅需要“新工科”，也需要“新文科”。新文科建设的提出绝不是新工科建设的简单效仿与概念移植，而是根植于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之中，与工、农、医科建设并行的新时代高等教育重大改革与发展战略。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重塑学科体系

20世纪以来，知识成果越来越多地在应用情景、交叉学科环境下诞生，由此催生了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萌芽。1994年，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首次提出有关知识生产模式变化的新观点。根据吉本斯等人的论述，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以主要在大学中被制度化的学科知识研究为特点的生产模式，知识生产和质量评判被局限在相对确定的学术共同体之内，这可以称之为模式1。这种学科型、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模式曾经为人类近代史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但其带来的学科条状分割、与社会利益脱节等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根据吉本斯等人的描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一种以情境性、应用性、社会弥散性和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生产新模式产生了，这就是模式2。模式2解决了模式1中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问题，将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到一起，并且首次将社会问责渗透进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中。随着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兴起以及由非线性动态创新范式驱动的协同创新集群的兴起，“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初见端倪。模式3的核心概念包含了“集群、创新网络、分形研究、教育与创新生态系统”等要素。同时，模式3所处的适应性情景是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所构成的“四重螺旋”。这意味着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知识生产，即“公众”和“公民社会”既是知识创新的用户，同时也被纳入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成为知识生产的行为主体。人文社会学科的演进逻辑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轨迹一脉相承，学科是人们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对知识进行的临时分类，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逐渐发现了知识生产的规律，这就是知识生产模式。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学科所代表的暂时知识分类和组织方式将难以符合知识的实际发展需求，学科既有的知识组织方式将发生变化，知识在碰撞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生产模式。人文科学主要关注人类自身的观念、道德、精神、情感和价值；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人文社会学科的变迁轨迹，与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逻辑相伴而行。随着知识大爆炸和社会问题复杂化，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分类日益丰富多元。一方面，在遵循自身学科发展逻辑的同时，人文社会学科要反思基于学科兴趣的传统范式能否满足社会需要，例如在我国，商品化的学科知识生产与行政化的学科专业目录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学科的分化与融合同步进行，任何学科都要

囊括更多种类的核心知识，而不再是由单一的核心知识构成，人文社会学科面临着分化与重组。

（二）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对于新型文科人才的需求

2017年6月，作为国内重要的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现代服务业基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即“中国光谷”）通过“产业政策众筹”颁布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于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针对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给予更强大、更精准的支持力度。《意见》将创业设计、直播/电竞、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新媒体、文漫影游、在线教育和出版等七大产业领域确定为重点支持对象。这一政策的发布反映了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的关注热点与发展趋势，显示网络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新型文科人才的巨大需求。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报告中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世界正在发生的新变革，迫切需要高校培养大量新型文科人才，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源头上贡献力量，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

（三）我国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我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代之后，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以及剧烈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无疑会更加艰巨，这需要将实践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更有力地结合起来。经过百年来不懈的实践探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根植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以及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这些经验背后所蕴藏的宝贵逻辑规律和重要理论内涵都亟待我们对其进行凝练、提升与阐发，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实践与理论不可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离不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地

予以指导。因此，当务之急要立足本土，培养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呼唤着新文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

（四）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

一方面，新文科建设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当前所面临的新趋势与新挑战。2017年1月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明确提出，要“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透露出重视文科发展、优化文科生态的政策信息。与此同时，“双一流”建设的遴选条件进一步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支撑”“运用新知识新理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科学普及、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成效显著”“增强文化自信、具有较强的国际文化传播影响力”等内容，要达成这些指标，显然离不开文科建设的有力支撑，更需要我们激发文科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校在文科建设上存在的一系列不足同样推动着我国高校进行学科整合与内涵建设。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文科人才培养现状面临着与社会实际需求脱离、改革创新明显滞后、人才培养模式固化陈旧等一系列问题。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高校为了效益的最大化，往往将经费、场地、招生指标等资源向建设周期更短、效益产出更快的理工科倾斜，导致人文社会科学在部分高校的发展出现边缘化的问题，亟待转型升级。

二、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新文科是一种基于传统文科而又超越传统文科，以新时代、新经济与新产业为背景，融合了理、工等诸多外部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新文科建设提倡弱化学科边界，持续推进面向国家、社会、产业需求为中心议题的学科汇聚与人才培养，同时借助现代科技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体系，更好地对科技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阐释和回应。

（一）新文科建设“新”在何处

1.在建设目标上，由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

“主动”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建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国家近年来相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

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互联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重大战略，新文科建设就是要根据上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需要，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主动布局、设置、建设和发展相关新文科专业，致力于培养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新型文科领军人才；二是主动引领行业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以及新兴产业形态的出现，促使人文社会学科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的动力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人才需求是全方位的，例如创意设计、文漫影游、在线教育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带来了复合型文科人才的需求，而传统的囿于学科内部的文科培养模式显然无法予以满足。因此，新文科建设旨在通过充分调研、分析与预测行业与市场的需求，主动培养当前和未来行业急需的文科人才，从而积极应对行业的变化与发展；三是主动引领社会未来发展。新文科建设需要高校把握社会思潮的最新动向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预测未来社会对各种类型文科人才的需求，超前布局、建设、调整和发展国家、社会与产业未来所急需的新兴文科专业，及时发掘和培养能够引领国家、社会与产业发展的卓越文科人才；四是主动引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校是新文科建设的主阵地，在我国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进入内涵发展的背景下，新文科建设肩负着为我国高等教育拓围、增量、提质、创新的使命，通过对大量与社会需求脱轨的文科专业进行改造，引导更多的高校尤其是应用型高校脱离效率较低的基础文科研究，转向与社会发展结合更紧密的应用型文科研究，从而助力高校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显著提升高校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在学科管理上，由学科专业目录导向转向现实需求导向。自设立以来，学科专业目录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性文件，更是一种知识管理的方式，它通过规定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划分、所属门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招生、学位授予等要素，对我国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挥着规制性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是“一个对全国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的学

科设置、科研方向和人才培养具有最根本、最实质性影响的学科规范”。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学科的分化过程一直在持续进行，分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但随着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出现，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也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出现了学科整合的趋势，从而催生了为数众多的跨学科、跨专业研究领域，知识体系呈现出无序而庞杂的特点。再加上我国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其对自身的学科属性本身便抱有迷惘，或其学科地位存在争议，学科专业目录难以对其做出合适的安排，因此无论是从知识发展的普遍趋势还是我国的特殊情况来看，学科专业目录所试图扶植的体系化、秩序化的知识体系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新文科建设对于破解学科专业目录当前所遭遇的困境至关重要。新文科建设致力于破除专业壁垒与学科障碍，倡导不同学科的交织与融合：一方面要在强调专业基础融通性的基础上，倡导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不同多学科的交织、融合、渗透与拓展，另一方面还要倡导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形成文理交叉、文医交叉、文工交叉等新兴研究领域。通过对学科知识与社会实践、个体认知实践的整合，告别行政化的学科专业设置机制，建立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多元主体超（跨）学科发展模式。

3.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由单一专业培养走向多学科、模块化、产学研一体化培养。传统文科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是囿于专业内部的，学生从入校伊始到毕业工作，其学习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专业内部。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工作与专业不对口等现象却屡见不鲜，这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毕业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内真正开展跨学科、宽口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项目集中在一些精英大学的实验计划中，例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新文科建设的开展旨在打破高校人文社会学科长久以来保守封闭的专业教育模式，带动更多的高校走向多学科、模块化、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之路。在培养目标上，新文科建设旨在促进文科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兼具家国情怀与职业素养、理论水平与创造思维、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形成多元复合的知识背景与能力结构；在培养主体上，新文科建设要求高校、

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来，共同制定学生的培养规格、培养方式，使定向式、订单式培养更多地出现在我国高校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在培养过程上，新文科建设要求学科课程要跳出学科自身的逻辑体系以及学习时限要求，转而根据人才规格（专业规格或岗位规格）所需的核心素养结构来灵活设计模块化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在人才评价体系上，新文科建设要摒弃单一的评价体系，实现学生自身标准、高校标准、市场标准和国家标准四者的多元结合。

（二）新文科建设重点涉及的领域

新文科建设需要在立足国情、深刻把握人文社会发展规律上，明确以下重点把握的领域。

1.传统文科转型升级产生的新文科传统文科的教学内容自古以来被视为自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闲阶级进行心智训练的重要途径。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深入，高校毕业生的能力素质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发酵，这种矛盾对于文科专业来说尤其严重。教育部于2016年发布的近年来就业率较低的15个专业名单中，有13个专业属于文科专业。在汹涌而来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面前，传统文科的应对手段显得有些乏善可陈。例如现有的人工翻译工作正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所取代，新闻写作也正在被写作机器人所代替，法律行业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人工智能系统辅助、甚至独立起草法律文件、备忘录和判决书的时代即将到来，有研究认为律师助理和法律助理被自动化取代的概率高达94%。这些引发人们对翻译、新闻以及法学等传统文科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担忧，传统文科亟待转型升级。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新时代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本的全面开工，我国高校传统文科的这种转型升级不仅仅停留在教学内容、研究对象等方面，更是从外延到内涵，从理念到文化，从管理模式到培养模式，从教材建设到教师队伍建设，从课程质量到毕业生质量的全方位升级，从而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重要一环。

2.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产生的新文科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新困难、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在

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来自各方力量的支持。高校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在人力资源、学科门类、基础研究力量以及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高校应基于自身特色与优势，组建跨学科复合型研究团队开展政策研究、区域研究并培养相应人才。一方面不断产生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政策思想，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战略建议，发挥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功能，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高校增强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同时，从培养区域国别+交叉领域+语言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及时反映、汇集和上传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与需求，从社会舆论层面去间接服务政府决策，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建立新型智库，服务国家战略发展，也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3.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中产生的新文科有学者将当前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认为“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产学研结合为特征，这就要求高校对于新兴产业领域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 APEC 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创意设计、直播电竞等大量新兴技术与产业领域的不断崛起，催生着新兴研究领域的不断形成，这将是新文科建设涉及的重要领域。例如电竞游戏的创意策划，与无人驾驶技术配套的政策、法律等问题的研究、与基因编辑有关的伦理问题研究等。此外，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观点，范式的转化会催生新的科学成就。与新科技革命相伴而来的是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同样会催生新的文科研究领域，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人们消费方式变革的研究，运用计算机模拟、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问题进行的研究等。

4.社会主要矛盾变更与人民需求拓展催生的新

文科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化说明人民生活的需要在领域上得到拓展、在层次上得到提升。人民生活除了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外，还拓展为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需要。在政治生活领域要求享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果，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求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包括人身、财产安全在内的多方面安全感，在生态文明领域要求享用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针对这些需要，新文科建设应该拓展相应的研究视野与人才培养领域，从而更好地回应人民的诉求。例如，如何通过智能技术的运用，使公民的政治意愿的表达渠道更为畅通，进而更好地发挥公民的积极性（智能政治学）；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激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从而应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智能社会学）；如何借助统一集、灰系统、消错学等人工智能方法的运用促进审判结果的科学化、公正化与合理化（智能法学）等研究领域，都是新文科建设应涉及的内容。

三、我国高校实施新文科建设的路径框架

（一）深入解读新文科建设内涵，凝聚新文科建设共识

作为新文科建设的对比和参照，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我国新工科建设在范式、框架、路径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意义。新工科自2016年被提出后，教育部高教司历经多次调研与严谨论证，于2017年颁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教高司函〔2017〕6号），正式推出了新工科计划，并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等指导性文件。在此基础上，各级各类高校均积极响应和启动新工科建设行动，学界也兴起了对于新工科建设的大讨论，新工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不难看出，政府在学科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新文科建设同样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宏观指导与统筹，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指导性政策，释放出明确的整体建设方案，并鼓励学界加强对相关政策的深入解读与广泛宣传，以凝聚新文科建设的共识，确保新

文科建设的实践开展与中央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二）优化学科生态，创设多主体联动的动态专业设置、调整与淘汰机制

优化学科生态，一方面要求高校建立面向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新兴人文社会学科，例如传统文科与人工智能产业的结合。国务院于2017年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鼓励高校在原有基础上拓宽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内容，构建“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重视人工智能与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高校可以此为指导，加强产学研合作，找准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结合点，积极寻求与科研院所以及产业研发机构等单位的对接，在人工智能相关学科方面开展合作。另一方面，在一些应用性较强、针对性较明确的专业，高校甚至可以在办学实践中适当“淡化”专业意识，通过与产业的联动，根据岗位实际需求共同规划与设计人才培养的定位、模式、内容以及评价标准，变专业为导向的学习过程为岗位的直接训练过程，从而使毕业生与工作岗位之间得以“无缝对接”。

与此同时，建立多主体联动的动态专业设置、调整与淘汰机制对于新文科建设而言尤其重要。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推进，新矛盾、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更新迭代的周期将不断缩短，国家、社会与产业未来对于新文科专业及其人才培养的要求不断变化将成为常态，尤其是那些与社会现实需求、产业一线紧密相关的专业更是如此。因此，当务之急是对指令性的学科专业目录式学科管理进行改革，淡化其管理和行政功能，强调目录的决策咨询价值，尊重知识增长的自发秩序。同时充分调动不同利益主体合作育人的积极性，通过政府统筹、行业参与、校企合作、协同办学、科教融合、区域联动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建立新文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及时调整文科专业设置，修改或完善人才培养方向、目标、标准、方案、模式以及课程和教学内容等，从而保证所培养的新文科人才不会滞后于国家、社会和产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三）分层次、分类别进行新文科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产业的转型升级依赖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新文科建设，不同高校在服务面向、目标定位、学校类型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应当根据自身服务面向、整体优势以及培养特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新文科建设策略。传统文科优势高校一般以综合性高校为主，办学历史长，学科门类齐全，此类高校在新文科建设中不应追求大而全，而应做到小而精，力求将每个文科专业都建成精品。一方面，注重巩固与发展那些与学校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适应并能够促进其他门类发展的文科专业，主动跟踪时代发展趋势，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聚焦党和国家关心的战略和政策问题，在探索新型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也要致力于打造新时代的高校智库，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为国家机关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应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理工优势类高校应依托自身优势，选择与学校传统优势理工学科直接相关的学科领域培育若干新兴交叉文科专业，并以此为基础，打破学科专业与院系的壁垒，创立跨学科课程体系，致力于跨学科综合研究，谋求建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综合发展的学科创新平台。同时，缩减甚至裁撤一些就业率不高、办学同质化程度高的基础类文科办学规模，集中资源与精力发展优势学科；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院校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行业背景和办学资源，拥有一些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应扎根于地方实际与行业背景，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应用研究之路，努力提高特色文科的学科实力和影响力，寻求建立应用型、特色化文科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起完备的人才体系，以产学研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做贡献、求发展。

（四）践行“质量革命”，深入推进一流文科专业建设

新文科建设还应与我国高等教育既有的战略规划相协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一流文科专业的建设

正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而新文科建设也为一流文科专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此，高校需要与教育行政部门通力合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对于高校而言，首要任务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将课程建设作为最基础和最根本的工作，以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等文件为指导，淘汰文科专业泛滥的“水课”，打造有深度、有难度的“金课”，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型和挑战度。同时，完善教师评价考核制度，鼓励教师创新课堂教学设计，将“智能+技术”等方式充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加快在线课程、混合课程、虚拟仿真课程等新型课程的建设，探索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人文社会学科新型教育教学方式。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需要切实抓好质量保障工作，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库平台为基准，开展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的三级专业认证，建成“基本质量标准认证—国家质量标准认证—国际质量标准认证”的三级专业认证体系，形成从质量理念、质量标准到质量文化、质量体系的系统设计，在打造“金专”的同时淘汰“水专”，建立起以数据和事实说话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常态检测体系，进而促进文科人才培养过程不断科学化。

（五）夯实文科专业基础，重拾人文社科的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Carr）在《玻璃笼子：自动化和我们的未来》一书中这样问道：“计算机、自动化、人工智能正让我们变得愚笨不堪？技术进步释放了什么？又束缚了什么？这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倒退？”诸如此类的追问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技术本身很难对其自身所处的状态进行客观评价。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清醒而又理性的声音来审视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文社会学科正是扮演这一角色的不二选择，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然而，近年来在社会上一直蔓延着“理科生入世而有用，文科生自由而无用”这一对于文科的“全民”偏见。究其原因，一方面要归咎于现代社会实用主义风气下大众的趋利倾向，另一方面也源于人文社会学科自身专业基础相较于理工学科更

为薄弱，一些学科出现了“空心化”的弊病。不少学者每每在论及人文社会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时总是用到“精神”“心灵”“修养”“情操”之类空洞的口号，人文学者对于自我身心修养的关注似乎远远大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导致人文社会学科教育被不少人鄙为风花雪月般的小资教育，更加引发人文社会学科在高校逐渐被边缘化的问题。

显然，新文科建设的开展可以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为自己“正名”的一个契机。人文社会学科一则需要借助新文科建设的大潮夯实自身的专业知识基础，强化相关文科专业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对于文献的鉴别与考据能力以及进行规范化科学研究的能力，强化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自身的“核心素养”；二则需要学生在关注自我身心修养的同时重拾人文社科的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以及建立在逻辑与分析之上的批判性思维，使得人文社会学科既能够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拓展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又能够对其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三则需要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们及时关注由于科技进步与产业革命带来的失业、伦理、法律、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同时积极探索人文社会学科可以介入的其他社会空间，把握“机器焦虑”与“技术恐惧”等核心议题，守住人文社会学科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亩三分地。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建设的开展可谓是恰逢其时。

（六）改革文科评价制度，构建价值多元、方法灵活的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而规范的学术评价制度是新文科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人文社会学科评价的专业性、复杂性与评价对象对大众影响及其效果的感觉性、表面性；真理的一元性与价值的一元和多元性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对评价体系概括的难度。现行的文科评价系统与评价标准大多照搬理工科，评价的模式与方法较为机械单一，迷恋计量化考核，追求数字指标，这些做法既忽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差异以及不同类型研究成果的功能定位，也无视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非显性、滞后性等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科建设需要“以评促建”，通过建立价值多元、方法灵活的评价体系来引导整个人文社科的健康发展。

结合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特点，建立完善的多元主体评价体系对于新文科建设而言至关重要。传统文科研究最被人诟病之处在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研究者们满足于在大学院墙内自娱自乐而脱离社会实际，新文科建设应当致力于形成学术同行、政府、产业、社会有机结合的评价机制，同时完善代表作评价制度、听证制度、回避制度、公示制度、反馈制度、申诉制度等保障性制度设计，使高校文科研究对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其次，差异化的评价策略对于新文科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样必不可少。与产业直接对接、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特征，这注定我们不能套用传统的、以论文发表为主要指标的评价体系。针对与产业结合紧密的应用型文科院校与专业，应当破除论文至上的功利主义评价思维，而将具体的产出成果及其社会效用科学地纳入评价标准；针对致力于基础性文科研究的院校和专业，要打破以期刊等级替代论文价值、以文章数量替代论文质量的畸形评价模式，学者或学术组织只要拿得出经得住同行严格评审的学术成果，就能够获得相应的权益和资源。

四、结语

文科教育新范式的形成和成熟需要时间，文科教育的产出和影响较之理工科也具有滞后性，在探索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免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与挑战，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通力合作与交流总结，及时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实施与进步。其实，无论是新工科、新文科还是新医科、新农科，究其本质，都是相通甚至是相同的，它们都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为出发点，破除学科壁垒与障碍，建立与国家发展战略、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四新”建设的同步进行，中国新时代高等教育的“质量革命”必定会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段 禹，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崔延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原文刊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社会需求与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

宁琦

自2018年教育部等部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并提出了新文科建设概念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此广泛关注。为什么提出新文科建设？其核心任务是什么？本文认为，新文科的提出，旨在回应时代变化对高素质人才的诉求，并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进行创新。新文科建设源自社会需求，从人类社会发​​展所遇到的共同性问题需要“合力”解决，到“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跨学科人才”支撑，从人文教育需要向综合素养培养发展，到学科发展自身需要求变求新的“内部冲动”，无不要求“升级换代”的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核心任务是卓越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创新。

一、新文科的社会需求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根源，都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尽管新文科并非新生事物，也不存在新旧之争，但其内涵指向继承传统、立足时代、突破局限、勇于创新，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加有助于解决时代进步和未来发展中的问题。新文科建设的本质是问题驱动式创新，即既有的文科建设，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需要赋予其更加有力的动能，推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质量迈上一个新台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新文科建设源自解决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共同问题的现实需求。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但由此带来的很多问题和挑战也都超越国家和地区疆界，如战争、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信仰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关系到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有明显的全球性、共同性和综合性特征，已非一国之力、更非某一领域、某一学科的一己之力能够解决，需要集中全世界的智慧，所有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通力协作，从不同角度贡献知识和力量。然而令人忧虑的是，随着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呈现逆流之势，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也有“失控”的风险。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共同解决人类社会“共通性”问题的愿望形成对冲，甚至产生“负迁移”作用。因此，在此时提出新文科建设显得越发必要。尽管新文科建设不可能承载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重担，解决世界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其倡导的融合中外智慧、融合学科内外的理念有利于“正向”价值观的引导和品格塑造，无疑对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共同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文科建设源自服务国家战略的客观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需要更全面系统、也更细致和具体地理解世界，深入思考自身对人类共同命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交了一个理性可行的“中国方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是一个浩瀚巨大的工程，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发展规划，既需要战略规划人才，也需要满足战术需要的专门人才，更需要具有全球视野、“一专多能”“一精多会”的复合型、综合型、融合型创新人才。为此，急需包括文科在内的各种智力资

源的有力支撑。通过新文科建设，打破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探讨人类社会在当下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况，使传统文科与新科技革命形成合力，为社会发展提供持续思想和智力支持，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文科建设源自人文教育的必然需求。在高校的人才培养中，除需要学生养成特定的学科知识修养外，还需要文化素养、科技素养和哲学素养，这些素养主要是以文科教育作为支撑，帮助学生全面提升思维、素质和能力，学以成人。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他可以成为有用的工具，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人文教育要求新文科在人才培养中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反映和适应社会转型发展的新要求。西方各国在高校中推行“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实际上反映了时代变化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高校的人文教育需要补上科技素养和哲学素养不高的短板，倡导人文社科融合发展的新文科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倡议实施的，从而满足大学生对科技素养和哲学素养教育的需求。

新文科建设源自于学科发展自身求变的内在需求。传统意义的文科，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统称，常被称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观念、文化和价值，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和阐释具体的个人及其主观世界之外的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文学科所关注的人文精神是以人性的自觉与实践为核心贯穿在人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是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的养成，不是天生的，是在对自古以来优秀传统文化

的学习和继承之中获得滋养，然后内化于人的精神境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社会现象，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与人文现象一样，都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产物来构成的。由此可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活整体，彼此相互补充、渗透和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划分过细，导致学科视野狭窄，学科范式固化，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学科自身的发展。社会科学学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借助科技的发展，走上了科学实证的发展道路。人文学科面对科技发展的冲击，也在反思自身的问题中求变。数字人文技术的新发展实际上已经展示了人文学科自我革命的倾向，因此，无论是社会科学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在寻求内部和外部的交叉融合，以此来打破传统学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甚至寻求与人文社会科学之外学科的联合，如自然科学、信息科学，至少是借鉴其科学研究的方法、理念以及运用其最新的技术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文科建设反映了文科自身发展遭遇困境后的革新精神。

任何学科体系从来都是遵循需求是源、质量是命的朴素道理，从来都是在创新发展中获得新生并持续进步的。新文科建设的提出，就是要通过创新，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运用跨学科思维，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彻底打破学科壁垒，从而推动文科的全面复兴和发展。让文科的“无用之用”成大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人的精神和思想、构筑社会的文化与秩序。与此同时，破除文科“无用之用”的藩篱，让文科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从“有用之用”的角度去探索文科教育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改变哲学社会科学解决当代问题的滞后和被动状态，真正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卓越的人才支撑和先进的理论支撑。

二、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

新文科建设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创新性、主动性、发展性、融通性和卓越性。推动新文科建

设，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主动承担新使命，紧扣时代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和科技革命新进展，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和知识活动规律，遵循文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通过跨学科交叉、多学科协同为各学科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创新与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学科内涵决定其支撑体系的形成，以及外部印象、评价和反应。在学科内部，进行科学管理、消除壁垒、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挖掘潜力、提升能力；在学科外部，引进优质人才、扩大国内国际合作、深度参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通过服务与共享不断扩大学科的国内国际影响，切实发挥学科建设的引领作用。学科建设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是体现其服务社会的关键。尽管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五大基本职能，就高校新文科建设而言，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创新是其核心任务，这是对前述各种社会需求的综合性回应，而非割裂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对高校而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中之重”，攸关其他三项职能能否实现。只有将这两个核心任务落地、落实、落细，才能打好基础，最大程度服务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新文科建设关乎的是文科教育改革，不仅要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文科专业的教育教学状况，更重要的是要运用新理念对文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术研究范式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固本强基的同时开拓创新。

一要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效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讲求能力与素质培养并重，对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和实现路径进行全面探索，强调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持续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需求，形成明确的文科学科发展定位：主动创新求变，追求卓越，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时代需求密切对接，通过跨学科交叉，以及多学科融通、协作与资源共享，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具有信

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特征的手段和方法去探索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融合型卓越人才和打造具有指引作用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

二要有组织、分层次开展卓越拔尖文科人才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监督和保障措施，探索本、硕、博三级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科学设计交叉学科和专业方向，搭建多样性的学习成长平台。突出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探讨符合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的人才培养途径、条件、方式、方案、课程体系、质量标准，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建立起由多学科知识所构成的综合知识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优质专业选择、更多的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机会。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更多开放式的发展机会，使文科教育形式和手段更为多元化。通过注入现代科技的最新知识、技能和思想，使学生具有适应当下和未来挑战的卓越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要有计划、多渠道加强师资队伍能力建设。持续保持和进一步提升现有人才队伍的质量和竞争力，对中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和必要扶持，激发团队的潜力和活力；选拔和引进有潜质的青年学者，帮助他们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和与学界的对接，提升人才引进质量和适应性，确保师资队伍可持续健康发展。

知识体系创新是新文科建设的又一核心任务。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需要的不断增加，高校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主力军，成为知识创新与发展的核心力量。“与社会其他组织相比，大学的知识创新与发展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仅得益于大学特殊的知识共同体构成，更得益于大学多样化的功能需求使其知识活动更具活力、更具创新性。”

新文科建设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摒弃封闭的研究模式，走向开放与协作，不仅是文科领域各专业之间融通融合和协作

共享，更要与理科、工科、医科开展更大跨度的交叉与合作，共同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物质、精神与文化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并在与世界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发展出兼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的思想和知识创新成果。

教师是高校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创造条件全力支持本学科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跨学科团队合作，强调原创性和前瞻性，以长远的眼光去发掘和研究更具普遍意义和基础意义的研究课题，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提升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能力，为国家的未来之需做好充足的研究和理论准备。

必须指出，高校文科的知识创新与发展能力，首先要服务于人才培养，教学、教研相长，有意识对学生进行科学素养训练，使之具备基本的研究能力和学术积累。开展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必须着眼于国家与世界的发展需要，既要坚定守成、传承文明，又要具有生产力、创造力、创新能力。努力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学术研究范式的局限，通过学科整合、文理医工交叉等，引入先进的研究方法。积极参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物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飞速发展和变化，由此带来诸多的矛盾和不平衡，甚至带来社会的危机。当今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文化、道德、伦理、信仰、权力、价值观、思维习惯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新的现象、新的形态，挑战着我们既有的对人、对社会的常识性认识。

我们强调新文科建设并非是在贬低科技的重要性。相反，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更应该引起文

科学家的关注，甚至要大力开展科技人文社会科学的融通研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今天的科技已经有各种提升、改变人类能力的方法，而在未来这种改变恐怕将会更剧烈。他担心，若任由作为前沿技术的生物技术没有节制的发展，将会改变人的心智，从而导致人性的丧失。他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发出警告，“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曾说，“我不担心人工智能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问题，但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那样思考问题——摒弃同情心和价值观，并且不计后果”“光有科技是不够的，科技要与人文和人性结合，才能产生让我们的心为之歌唱的结果”。科技人文融通发展就是要实现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和谐发展，反对失去人文约束的科学主义和以科学主义之名而造成的功利主义，从而实现人、教育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乌托邦”理想：“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意识。”

一言以蔽之，新文科建设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在实践层面，如何创新发展新文科，如何处理新文科的价值性与功利化之间的矛盾，文科领域各专业之间如何实现科学融通或融合，文科领域和理工医科领域各专业如何有机交叉，如何能够在创新领域和知识领域推动文科自身的建设与成长等等，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以真正落实新文科的内涵建设，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文科质量文化。

（宁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原文刊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新文科与思维方式、学术创新

刘曙光

进入新时代，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特点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求，新文科的概念应运而生。新文科建设要以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交叉、交流、交融为基础，重构或新构学术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反思近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催生文科未来发展的新内容、新学科、新专业、新范式、新方法，优化学者的知识结构，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从整体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构建中国的知识体系。

一、新文科之“新”

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部门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成为2019年度十大教育事件。随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启动，新文科的概念逐渐热了起来。那么，新文科到底“新”在哪里？

一般认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最早是2017年由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强调把新技术融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通过学科调整和机构改革来重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平台，从而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学习。新文科建设需要各个学科交流、交叉、交融，文科不仅要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交叉，更需要打破其内部的学科壁垒。

每一新概念的内涵都有一个逐渐形成、趋于稳定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过程。新文科的“新”，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文与科技的跨学科研究，将人置于关注和思考的中心，更关注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命运。将传统的人文关怀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全面考虑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给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以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揭示人的共通之处以及人生的意义。这也是“科技与人文”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目标。

第二，教育方式、培养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社会对人才需要的特点发生了变化，需要目光远大、学识渊博、圆融贯通、情感优美的跨学

科的复合型人才。除了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交叉、顺应“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外，也强调文科各学科视阈等融合。新文科倡导跨院系选课、开课，并推出了跨学科的专业。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以新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问题为导向，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有系统、较全面的研究。

第四，学科的开放、交叉、融合，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和培养，通过自觉地构建、融入各种各样的学术共同体，来重建因学科划分而失去的知识的统一性、体系性，来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学者要强烈意识到自流在学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新文科的这四种“新”含义不是相互否定、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总之，新文科建设，要求回应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实践理性、价值取向、时代精神、技术手段，发展出新的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发展出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新兴专业，培养出具有广阔视野、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新兴人才，全面提高文科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系统性、整体性的知识体系。新文科是传统文科的与时俱进，是传统文科的转型、变革、自新。

学科的交叉融合，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其实，在传统文科阶段，学科的交叉融合就早已存在，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单一学科。如，哲学作为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政治学作为统领学科，都是交叉学科。只是到现在，这种交叉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凸显，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二、新文科：思维方式的转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科，一个时代的文科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新文科的提出，正是为了克服传统文科的局限性，更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新使命。

1. 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从简单性方法到复杂性方法的转换。“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传统文科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时代认识能力的局限，传统文科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更多的是从微观入手、从简单性方法着眼，强调研究的深度，力图揭示其客观规律，而从中观或宏观层面、从广度上、从整体性、复杂性方面所进行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这正如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一样，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必须先以微观为基础，再逐渐扩大到中观、宏观，实现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嬗变。

知识原本就没有分界，没有学科的划分。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认识手段等的限制，当人们在无法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清晰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采用简单性方法，即将整体的科学进行分类，将其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这里的“简单性方法”没有任何的贬义，“简单性”只是相对于“复杂性”而言的，简单性方法并不简单，它是认识的必经阶段，是人们认识世界极为有效的方法。简单性方法是学科划分的基础，但是，简单性方法并不等同于学科划分的方法，更不是指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简单。简单性方法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和培养缺失：其一，就像“瞎子摸象”，它孤立、静止、片面地研究某一领域、某一层级、某一侧面，只是把握了整体的某一个部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其二，它以一种片面、狭隘的眼光来看待发展变化的总体，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往往会导致一些研究者以自己所抓住的某一方面来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甚至反对整个体系；往往导致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代替辩证思维、整体性思维，造成不同领域、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内的研究互不相通，彼此隔绝。

传统文科所采用简单性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

行之有效的，学科建设任务明确，专业界限清晰，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科研效率较高。但是，随之也出现了学科间条块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专业壁垒森严，制约人才全面发展，培养出来的人才“隔行如隔山”，批判思维能力欠缺、创新能力萎缩。这也是我国文科教育出现如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学术原创能力不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有专家缺大师，缺乏观照现实的能力。

近些年来，传统文科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并力图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和培养来加以解决。2015年，国务院颁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明确指出要“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为数不少的高校提出要设立多层次的跨学科教育项目，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在运用简单性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世界本来就是简单性与复杂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遭遇困难。这也促使人们对简单性方法及其所带来的弊端进行反思，转换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何谓复杂性？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指出：“复杂的东西不能用‘复杂性’一词来概括，被归结为一条所谓的复杂性规律，被化归为一个复杂性观念。复杂性是不能够用简单的方法来加以确定并取代简单性的东西。”复杂性思维方法，可以概括为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复杂性是简单性和复杂性的统一”。复杂性方法不是对简单性方法的否定、颠覆和消灭，而是对简单性方法的批判、修正、扬弃、整合和补充。

复杂性方法要求人们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批评那些只会使用简单性方法、不懂得复杂性思维的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传统文科完成了其担负的历史使命，为新文科体系的探讨和建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传统文科与新文科，两者不是替代关系，不是对立关系。新文科的提出，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否定和消灭，而是对传统文科的批判、修正、整合、补充和提升，是希望通过文科的内部的学科融合和开拓创新，以及文科与

理、工、农、医的交叉、交融，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更广博的学术视角、更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更深厚的学术积累，来研究、认识 and 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培养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

2. 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从还原论到整体论。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从思维方式上看，也是从“分析—综合”的还原论到“联系性—系统性”的整体论的转换。这里说的“转换”，不是说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代替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而是说新文科的研究方式是以还原论为基础、以整体论为主导，而不再像传统文科时代那样是以还原论为主导。

关于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含义和关系，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谈论的一个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科学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大体上经历了“整体论——还原论——整体论”三个阶段。后一个阶段不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简单否定和消灭，而是一个吸取了前一阶段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是扬弃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人类思维方式所经历的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一阶段，古代的素朴的整体论或直观的思辨论。在人类文明早期，人们的观念实质上是整体性而不是破碎性的。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把握也是整体性的，只不过这种整体性把握是笼统的、直观的、朴素的，没有对事物内部各层次、各侧面作细致的分析和综合，没有经过科学的实验，也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所以，没有学科的划分，古代的文史哲不分家。孔子、亚里士多德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体现出学术研究原初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尤其是中国古代只有文科，没有理工科。

伴随着西学东渐，只有当西方的分类、分科方法传入中国，我们才开始借鉴西方的理论来审视、梳理、解读、阐释、评判、安排、划分、解构甚至剪裁中国原本为一体的材料。毫无疑问，这种“以西律中”“移中就西”、削足适履的做法，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第二阶段，“分析——综合”的还原论方法，是近四百年以来人类科学活动所遵循的方法，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整体

是由部分构成的，各个部分清楚了就可以重构整体，整体没有超越其构成部分的自己的特性。还原论方法是先将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静止地加以解析和分析；然后，将解析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反向综合，推断出整体的性质和功能。这样就构成了现代科学的一系列学科。这种还原论的方法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基于还原论的现代科学在知识论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为了认识便利而对世界所作的各种分类和学科划分，使我们的研究走向套路化，对世界的认识走向“碎片化”，所产出成果的格调和境界不够高远。如，我们把本来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人为地分割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研究和教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很少交流，在一些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全面、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而，还原论“使得人们无法获得整体性的知识，进而导致了环境、社会乃至文明的分裂性危机”。

第三阶段，新的整体论方法或者说辩证的整体论。由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还原论必然会遭遇的尴尬是，“对构成性的实体的探究并不能替代对世界复杂过程的理解，对部分与层次的理解也不可完全拼接为对整体性的把握”。新的整体论方法不是对还原论方法的否定和颠覆，相反，它是以还原论方法为基础，但又是对还原论方法的超越。还原论与整体论不是“两极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性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认识的发展，我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构建系统性、整体性的知识体系，不是某一（些）学科所能解决的。有些问题、矛盾，也不是在某一局部、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有更宏观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必须超越层次和领域。这就要求超越或突破“分析—综合”的还原论方法，从整体性上去思考和研究，从多学科、跨学科去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当以整体性去思考和研究某一复杂系统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某一局部、某一层次、某一侧面所看不到的东西，解决靠某一（些）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从古至今，我们对于中药毒性的认识大体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代的整体性的、直观的认识，将中药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等。第二阶段，还原论的方法，利用中药毒理学研究方法，从微观角度、细胞分子水平、基因分子水平探讨中药毒性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深层次机制。第三阶段，辩证的整体方法，“辨证论治”理论，中药毒性具有相对性，中药毒性可以为人类所用，成为治疗顽疾沉痾的利器。有毒中药也能用来指导临床治疗。第三阶段以第二阶段为基础。中医第二阶段的研究至今仍然是比较欠缺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之所以困难重重，最根本的可能是我们学者的知识结构是残缺的、破碎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者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有着“难以弥合的分裂”，难以“接着讲”或“综合创新”，难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创新，也就谈不上“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新文科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叠加。适应新的时代发展的需要，经过多学科、跨学科的密切合作，必然要淘汰过时的学科和专业，催生新的专业和学科，形成新的更为系统的、复杂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

三、新文科：学术创新的关键

新文科所带来的复杂性、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特别是复杂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以及新文科的学科交叉融合，特别是“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成为学术创新的关键。

1. 任何学科的创新都以知识整体性、体系性为基础。任何学科的创新都是以既有的知识整体性、体系性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学科，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是各个学者学术研究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体系。评价一个学者或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和相关的学科体系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自已的研究与相关的学科体系联系起来，把相关学科已有的体系作为共同的遗产，把推动相关学科的创新作为同时代学者的共同事业。这样，学者的研究才能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即在“照着讲”

的基础上“接着讲”。

如果说在传统文科阶段，学者研究的体系性、自觉性意识比较缺乏，那么，进入新文科时代，学者的研究就要在学科体系性、整体性方面做出自觉的努力，就要能够使不自觉地发生的事件自觉地发生。特别是一流的学者，要自觉地构建、融入各种各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共同体中进行协作、交流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还像传统文科阶段一样，一个学者缺乏学科整合能力，学科知识结构残缺，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自觉性，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那么，他是难以成为学术大家、大师的。

2. 学术创新必须顺应“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在二十世纪初，列宁谈到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问题。所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就是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以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对社会科学发生积极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概言之，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很多社会科学问题需要利用自然科学来解决。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人在20小时相继死亡。光绪帝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慈禧等谋杀？这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桩迷案。从2003年开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联合组成“清光绪帝死因”专项研究课题组，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光绪帝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等进行了历时5年的反复检验和缜密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是被毒杀的。

有人认为，理工农医等学科需要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而文科学者的科研是自主的个体行为。其实，新文科的跨学科、超学科性，也要求学者之间打破学科壁垒，联合攻关。这样，才能构建较为完整、较为系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北京100871）

（原文刊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